

# 群众不明真相 官员该担何责

↓是谁让群众不明真相的 东方早报 7月30日 作者:贾霞

## 【东方早报一评】

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,爱用“不明真相人员”“不明真相群众”等词句。这一说法耐人寻味,值得反思。(《群体性事件中少用“不明真相”》新华每日电讯7月28日)

过去十几年来,“不明真相”之于民众而言,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。它经常出现在群体性事件过后的官方解释或见诸媒体的新闻稿中,通常的表述是“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”。一般在发生群众大规模聚集的事件后,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会不假思索地祭出这一说法,且使用一分为二划分阵营的方法,指大部分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受“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”蛊惑与挑唆。真相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易接近的东西。通常而言,和普通群众距离比较远、关系也不那么密切的事件,不明真相很正常,也可以理解。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中,“不明真相”的发生逻辑却恰恰相反。许多事件的发生,老百姓是身在现场亲自参与的。

比如湖北石首事件,表面上去是因一非正常死亡人士的家属保护其亲人的遗体所引发,实则当地百姓对当地政府早已怨声载道,便借围观这种方式发泄不满。一些地方政府似乎特别钟情于这个词。大事小事发生,一概称之为“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聚集”,好像中国老百姓特别喜欢看热闹。一些领导似乎特别恐惧于群众聚集,哪怕只是看看热闹也不行。给外界的感觉是,他们似乎从“围观群众”那里很感到某种不安。为平息这种不安与恐惧感,围观的群众必须在短时间内被解散或者强行驱散,不论这种围观多么秩序井然多么安静平和。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:群众自己认为看到的是真相,而政府却偏说不是,且硬塞给他们另一个真相——你们是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的。

在早年信息沟通不畅的时代,某件事发生后,事件发生地官方解释是唯一的声音,也是唯一的“真相”。传媒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,终结了这种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。这个时代的特征是,真相不是一些闭目塞听的领导的禁脔。知道真相是群众的权利,哪怕他们只是在边上围观,也有权利知道真相。而网络、手机短信,则为他们寻求真相提供了工具便利。事件发生后,第一时间全国全世界都能看见,不借助官方媒体,真相照样可以传播。

以前我们也被告知,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”,后来就变成“不明真相”了。政府治理的现代化,应从让群众知道真相开始。

## 【现代快报再评】

新华社记者黄冠写的时评《群体性事件中少用“不明真相”》,不仅在于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,也在于发言者的身份,属新华社,有权威性。但愿各地的官员能听进去。

去年瓮安事件发生时,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指出,要打破群体性事件是“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”发生的公式。可是,听得进去的官员不是很多。什么“不明真相”、什么“少数坏人”、什么“煽动”,还一再被用来解释群体事件。不是那些地方官员不明白这套话语的陈旧和悖理,是因为这个公式便于“枪打出头鸟”。而解决社会矛盾,关键是要拓宽群众集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,使之成为社会的排气阀、减压阀和均衡器。

##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官腔与傲慢

↓“‘被就业’属个别”结论是怎么得来的? 新京报 7月29日 作者:曾颖

针对一些高校为提高就业率而产生的“被就业”现象,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说,绝大多数高校的就业率统计数据是认真准确的,据教育部的了解,“被就业”的问题只是个别情况。(7月28日《新京报》)

# 小监考官的镜鉴价值大于推广价值

↓小监考官的“耳光”价值大于推广价值 燕赵都市报 7月31日 作者:周东飞

## 【燕赵都市报一评】

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公检法系统竞聘笔试中,18名小学生被聘请担当“监考官”。在考试过程中,小“监考官”们认真负责,共发现了25名作弊者。凉州区委有关负责人说,将取消作弊者的考试资格,成绩按零分处理。(7月30日《兰州晨报》)

小“监考官”们能够抓住25名作弊者,当然不能说明他们比大“监考官”们看得更清楚,他们不过是没有沾染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的恶习而已。大人们都知道皇帝光着屁股,但是谁也不敢明说,只有那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勇于说出真相。

有人总是善于从各种各样的事件中发现正面价值,比方说“此举必将在凉州区的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方面产生积极的效应”。如此积极效应不知道是否意味着,下一次事关公检法等强势部门的考试中,又要请敢于秉公执法的小“监考官”们再度出山。孩子们的童心未泯能够发挥作用,前提在于出其不意,正如他们自己所言,“只想认真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”。如果有下一次,即便他们自己还秉持着理想,他们的老师、家长也未必不受种种暗示或影响。

指望靠孩子们的天真去拯救成人世界的腐化堕落,这本身就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思维模式。如果说凉州小“监考官”事件确有价值的,其“耳光”价值远远大于推广价值。面对这样的实验成果,职能部门应当反躬自问,在一次考试中,被赋予监督职责的人为何就陷入了敷衍塞责的泥沼之中?推及社会现实生活,太多的利益纠葛之中又有多少人在习惯性尸位素餐、装聋作哑。如果说他们丧失了孩子一般的童心,解决之道不是要简单恢复幼稚化思维,而是要从机制上确保每一个人敢于说真话、办实事。回到监考本身,让考试不受“熟人社会”的掣肘,其公正性远远胜于小“监考官”们的严格执法。

对于小“监考官”们的过度拔高,其实隐含着一种替灰色现实正名的心态。上过讲台的人都知道,台下任何人的举动尽收眼底,关键是台上的监管者出手还是不出手。这很像一个现实的暗喻,大多数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犯罪并不是作恶者掩藏的手段有多么高明,关键是手握职权的人有没有作为的动力。如果不作为也可以,他自然愿意通过“放水”来为自己捞取人情和利益。面对外界的质疑,甚至还不妨大喝一声“我一概不知”,或者反问一声“你想替谁说话”。有权必有责,失职必被究,这才是对付监管者失职的撒手锏,而不是用一群天真的孩子来掩盖问题的实质。

一个值得重视的背景是,这次考试的主角是公检法人员。或许他们的身份注定了监考的艰难,所以主管部门才想到用小学生的监考绝招。果然如此的话,更加无法说明小“监考官”的推广价值,反倒只能看出权力的无羁和失范。

## 【现代快报再评】

这篇评论说理很透彻,就是用词激烈了一点,也许说“小监考官的镜鉴价值大于推广价值”更中听一点。小学生的秉公执法,照见的是人情社会、关系社会和权力社会的不公正已司空见惯、积重难返。

明末思想家李贽提倡“童心说”,没能拯救世道人心,反而被系诏狱,断送了自身性命。今天我们“指望靠孩子们的天真去拯救成人世界的腐化堕落,这本身就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思维模式”。如何从机制上确保每一个人敢于说真话、办实事,如何把强势的权力装进笼子,那是比找小学生监考更难的事。

## 【新京报一评】

这个结论,似乎与当下整个社会对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感受,有不算小的差异。这差异究竟有多大,估计应该比“个别”要宽大一些。

这有点像身体感受到的温度和温度计给出的温度数不一样,最好的办法,就是再找一个更好更精确的温度计来测量一下,以判定究竟是温度计还是我们的感觉系统出了问题。这就如同即将就业的大学生及其家长们,他们在感觉比较纠结的“被就业”,与有关部门发布的信息有差别一样。最好的方法,就是找到一个权威的、且定量的调查数据作为参考。而非像“极个别”这种听来不太靠谱的定性词。

说出调查的方法,然后得出结论,其说服力远远大于不公开调查过程、只报告结果的方式。这是用科学态度解决问题的方法,也是以理服人的方法。公众也许并不太需要听到别人怎么样,而是需要知道我究竟怎么样?要解决我的感受问题,给我数据,比给我结论更重要。

相信教育部发言人回答“被就业”的问题,是为了让传闻变得平静甚至消失。但目前这种回复,显然离她想要的目标还远。在没有给出推论方法之前,公众对结果质疑甚至不理解,也是情有可原。因此,请告诉大家:“‘被就业’属个别”的结论是怎么得来的?

# 山西 GDP 负增长不代表政绩负增长

↓山西 GDP 负增长也是一种增长 燕赵都市报 7月30日 作者:石敬涛

## 【燕赵都市报一评】

就在城镇人均工资增幅、GDP等各项统计数字“捷报频传”之时,一个“报忧”的数字让人耳目一新。统计数据显示,上半年,山西GDP为3105.99亿元人民币,同比下降4.4%,成为全国唯一的负增长省份。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煤炭企业的重组、关闭等是该省经济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。(燕赵都市报7月30日)

唯一的“负增长”,在某些唯GDP至上的长官意志看来,确实面子挂不住。在你追我赶、不进则退的背景之下,该如何看待这个有些“另类”的、唯一的“负增长”呢?

出现“负增长”,有其自己独特的原因,那就是山西省正利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形成的市场倒逼机制,抓住当前煤炭产业休养生息、谋划转型的难得机遇,深入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。而这,必然以牺牲GDP的增长为代价。

凡事有得必有失,若能够按既定目标完成整个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,那么煤炭企业产业技术水平、生态环境保护、煤炭矿井资源回收率、自主创新能力、煤矿安全保障能力等都将有一个质的飞跃,将真正实现科学、长远的可持续发展。

一时的GDP之失,与长久的发展大计,孰轻孰重,一眼便知。但是,在现行的考核体系之下,一些地方政府却被眼前利益所束缚,拿不出“自我否定”的勇气和魄力,也没有“宁愿发展慢一点,也不能以破坏资源、牺牲环境为代价”的境界。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、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曾指出,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。

这意味着我们为GDP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消耗、高污染的沉重代价,而这种代价造成的资源损失、环境退化等“隐性成本”是无法估量的。而对于GDP的增长,无论大小,无论多少,无论快慢,民众可以说是越来越淡漠。之所以淡漠,无非就是有“增长”而无“发展”,公众并没有从GDP增长中享受福利;GDP仅仅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,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志。

正因为如此,我们应该追问:该休养生息、谋划转型的,又何止只是山西?也正因为如此,这个唯一的“负增长”是如此弥足珍贵。所以,我们应该给这个“负增长”一些掌声。

无独有偶,7月29日的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报道,上海市今年上半年GDP增长,也落后全国平均水平,而“落后”的原因,也是因为其正“酝酿转型”。同样,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久前也说过一句话:“不能为赶数据,又上落后生产力”。而要能真正做到“不能为赶数据,又上落后生产力”这一点,首先就应该能宽容和接受“负增长”,并通过这种“负增长”来实现经济转型,通过“负增长”来实现发展理念与模式的升华。这一“波浪式前进,螺旋式上升”之后再次的增长,才是真正的增长,才能让老百姓

得到好处,获得福利。

厘一厘“负增长”的舍与得,不难发现,我们其实得到了很多,失去的很少。

【现代快报再评】

有研究机构指出,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环境污染和道德缺失。这个发展代价大小倒在其次,就像打仗“惨胜”也是胜,虽然代价很大。问题主要在于,如果听任环境污染和道德缺失,发展既不可持续,也没有意义,所谓“代价”就只是没有胜利的牺牲。山西值此时机调整发展思路,不再追求高速度,是明智的,实践也将证明是合算的。中央说的“保增长”就是就全国而言,某些地方当然不能勉强。就山西一地而言,在发展时段上也应该容许有快有慢,好比一个人赶路,有时走慢点、甚至歇一会,是很正常和必要的。